

H B T S

张正明 刘玉堂 著

湖北通史

【先秦卷】

章开沅 张正明 罗福惠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北通史

张正明 刘玉堂 著

〔先秦卷〕

章开沅 张正明 罗福惠 主编

D B T S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通史·先秦卷/张正明,刘玉堂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

(湖北通史/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

ISBN 7-5622-1966-4/K·123

I. 湖… II. ①张…②刘… III. 地方史-湖北-先秦时代
IV. K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6330 号

HUBEI TONGSHI XIANQINJUAN

湖北通史·先秦卷

©张正明 刘玉堂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刘道静

封面设计:甘 英

责任校对:崔毅然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75

插页:8

字数:492千字

版次: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4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通过 10 余位史学专家数年的努力,300 余万字、8 卷本的《湖北通史》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对湖北乃至全国史学界,都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湖北历史值得深入研究和浓墨重彩地书写,理由大致有如下数端:

其一,湖北是中国大陆上最早有人类远祖活动的地方,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距今 80 万年~距今 70 万年左右的“郧县猿人”,大体上与陕西蓝田猿人的时代相同;距今 60 万年~距今 40 万年左右的“郧西猿人”与北京猿人的时代大致相同。

距今约 19 万年左右,长阳一带已有早期智人生存;距今 5 万年~距今 1 万年和距今 1.3 万多年以前,江陵鸡公山和房县分别有晚期智人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距今 8000 年~距今 7000 年的“城背溪文化”则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的文化遗迹。

距今 6300 年~距今 5300 年,沮漳江汉已有以三苗为主体的先民活动,属于巫山“大溪文化”,此时湖北境内已有水稻种植和原始的纺织技术;距今 5300 年~距今 4600 年,今湖北境内已有三

苗、百越、神农氏部落的活动,其代表为“屈家岭文化”,大型聚落和城垣防御体系的设置证明此时的先民已有定居,其古城是全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城之一;距今 4600 年 ~ 距今 4000 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其遗物证明当时已有不同程度的生产分工,治玉、冶铜、陶塑和彩陶技术均有相当高的水平。

公元前 22 世纪后期到公元前 21 世纪前期,尧、舜、禹所领部落在今湖北境内屡与三苗部落接触和冲突,直至公元前 16 世纪晚期,江汉地区已纳入夏王朝版图,但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蛮”一直在同夏王朝抗争;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仲丁时的商王朝在今汉口近郊黄陂建筑了军事据点盘龙城。

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的晚期,芈姓熊氏筭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始在荆山创业,随后建立了延祚 800 年的楚国。人们大多知道楚文化的灿烂辉煌,但恐怕未曾将其置入世界范围加以比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的世界上,就文化繁荣而言,楚国与古罗马帝国也不遑多让。应该说,直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还只是露出了海上冰山的顶角,今后的考古发现将会提供更多的证据。

其二,湖北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充分发掘、研究、利用这种历史文化资源,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史学工作者的天职。

湖北历史内容的丰富,体现在方方面面。就生产方面而言,从远古的水稻种植、冶金、治玉、制漆、纺织,到楚国及历代的修筑灌溉渠、治江治湖,直到清末屹立在汉阳的亚洲第一规模的铁厂,生动地体现了物质文明的演进之路。

从政治方面而言,楚国的立法创制、战国初期吴起的变法、此后统一或割据状态下的成败得失、历史剧变中的转型变化,其间蕴含着多少客观因素的影响制约和主观上人谋的臧否,值得后人分析和深思。

在思想文化方面,从随国的原始儒学代表人物季梁(比孔子约

早两个世纪),楚地(此处主要指河南、安徽)的道家老子,诗人屈原和宋玉,到汉代的王逸,东晋的习凿齿,唐代的孟浩然、皮日休,宋代的宋庠宋祁兄弟、米芾(画家),明代的张居正、熊廷弼、杨涟、公安派和竟陵派诸家,以及著《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均为全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到了清代,全国各界名人大增,但湖北仅有熊赐履、熊伯龙、王柏心、杨守敬、张裕钊、樊增祥在全国稍有文名。其实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还有具有鲜明民本色彩的诗人顾景星、坚定地批判理学的思想家秦笃辉、研究东北边疆地理的曹廷杰等,都有资格在全国思想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从种族和民族融合方面看,新石器晚期的湖北土著主要是三苗,其主体大概是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先民,此外还有越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先民)和巴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先民),到夏人殷人周人相继南下,于是出现了中原华夏文化和三苗文化、越文化、巴文化的融合。楚文化的“恢诡谲怪”、“惊彩绝艳”,正是这多种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其后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蒙族文化、满族文化以及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均曾对湖北文化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故楚之地出土的由钠钙化合物构成的玻璃珠,使我们有理由设想:中国西南可能有一条通往地中海沿岸的“玻璃之路”,而这条“玻璃之路”比中国北部的“丝绸之路”要早三四个世纪。当然这条“玻璃之路”目前还有待更多的发现和研究。

从反对暴政和反抗外来强敌以及革命传统方面看,湖北人民也有一种敢为天下先和敢负天下之重的精神。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口号的提出,到陈胜、吴广的率先倡议,到刘邦、项羽的终于灭秦(上述4人是楚人,不过不是湖北人);从王莽统治末年的绿林军起义,到宋末的抗元斗争,元末的徐寿辉、明玉珍、陈友谅起义,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英雄豪杰层出不穷。尤其是近现代史上湖

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为抗击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近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之后,湖北在这种新型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先烈先进和仁人志士。从辛亥武昌起义到北伐,从湖北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和多名湖北籍共产党人参加中共“一大”,到黄麻起义及其后建立多个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湖北人民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辉煌篇章。

由于湖北的地理位置绾毂南北,沟通东西,号称九省通衢,所以平时是人员货物集聚往来的枢纽,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一向发达;战时则是东南西北必然争夺的“四战之地”,先秦的吴楚之战、秦楚之战,汉魏之际的赤壁之战、彝陵之战,都是历史上的著名战例。而在历史上统一和革命的大业中,湖北的地理位置更显得突出和重要;宋初为完成统一大业,宋太祖定下的“先南后北”大计就是先取湖北;而南宋为了抗金和抗元,一直把湖北作为上游屏障;近现代的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和其后的北伐革命战争,都以占领武汉为推进革命的前期目标,孙中山与章太炎甚至还先后主张过定都武昌;抗日战争中,湖北境内发生过武汉保卫战和多次对日军的作战;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和华南,也必以武汉为通道和依托。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90年间,湖北尤其是武汉先后多次产生过重大的战略决策,这些既体现了湖北的重要战略地位,也对湖北乃至全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上所列,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荦荦大者,但仅此已足能证明湖北历史资源的丰富及其重大研究价值。

其三,迄今关于湖北历史的研究尚有不足。虽然围绕着湖北历史已有一批断代史、专门史以及就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而进行的研究成果问世,尤其是已有《嘉庆湖北通志》和《宣统湖北通志》(因完成于宣统年间,印刷于民国初年,故又称《民国湖北通志》)以及80年代以来编纂出版的大批地方志新书,但专著类的著作只涉

及历史长卷中的一个时段或一个方面,远不足以再现湖北历史整体;而地方志限于体例,分门别类钩稽罗列,篇幅浩繁而横向上互不统属,有益于专家研究和各专业部门运用,但对非本专业的人和一般读者而言,则显得过于专精,也难以把握整体的历史进程和编纂者总结的某些规律性认识。而且湖北近年所出版的地方志书大多是从鸦片战争以后续下来的,对古代的有关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多未整理和利用,因而给人难以衔接之感。

正是基于上述三点理由,我们编著了这一套《湖北通史》,力求重现湖北地区有史以来的环境变迁、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兴替、习俗演化和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全貌。

二

《湖北通史》不是已有的中国通史著作的具体而微的投影,也不是对其他省市的通史著作的简单模仿。为了达此目的,《湖北通史》编著组的全体成员始终围绕着“通”、“特”二字下功夫。

“通”,本来就是通史的基本要求,首先是时间维度的上下贯通。上下贯通不仅是指数千年的历史不应间断,各卷和各朝代或时段之间,注意分划和衔接,既不留下空白,亦不能出现重复和矛盾;更主要的是气势一贯、风格接近,尤其要求各卷作者在总体把握上具有相对一致的史识。其次是空间维度上的横向沟通。湖北是中国的一部分,数千年间的发展变化必然离不开中国乃至世界这个大背景,或者说湖北这个局部与中国和世界这个整体始终处于互动之中,有时是整体决定或制约局部,有时是局部影响整体。因此在考察湖北历史的时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情形,尤其是相邻各省的情形,也须了然于胸,才不致孤立地看待湖北历史。而且,现今的湖北省境,基本上是明清以来才逐步规范下来的,在此之前

的数千年中,湖北与湖南、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的行政归属屡有变化(如先秦的楚国曾领有两湖、贵州、河南乃至吴越之地,西汉开始设置的荆州所辖也远远大于今之湖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求首先以今之湖北省境的空间范围为主,但遇到思想影响、文化流播、人物迁徙、货物流通等问题,或者是牵涉到湖北局势发展的事件时,叙述或分析所及,必然会越出湖北的空间范围。

“通”的最后一层意思是建立“大史学”观念,不能仅把此书写成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史,也不能仅写成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史,它应该包括地理环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种族和民族融合、中外交流等各个方面,但又不是各个方面的拼混杂陈,而是要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来思考和表述,这应该是区域性通史和地方志的区别所在。

“特”是要求写出湖北历史的特色。湖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历史的各个方面自然与中国各地具有很多共性,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的自然环境条件不同,加上族群众多,故在远古的文明萌发阶段,文明程度即呈现出差序和梯次;即使在秦汉以后统一的条件下,由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民族构成、习俗传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社会稳定或动乱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的历史进程也出现或大或小的差异。因而无论是局部受到整体的影响还是局部对整体的影响,其情形和程度各具特色。

写出特色,决不仅是止于以湖北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湖北人物、事件、生产生活状况、社会习俗等等)为主要再现对象就可实现,尽管人各有其言行,事各有其原委及影响,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但这仍然近乎停留于表面。关键所在,是通过对长时段、多层面的研究,发掘湖北社会发展演变的特征、速度、方向和方式,发掘生活在该地域的人群的文化精神。所以通史虽以记叙为主,但

不能缺少哲学思维,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深层的思考和高度的升华。

当然还要抓住要领,即在关注全面时突出重点。历史的内容范围广、资料多,上至军国大事、政府的财政收支,下至市场上斗米斤盐的价格、老百姓的衣食起居,无不与当时的政局、社会和群众心理息息相关。对此,既不能取精微而遗广大,亦不能只写大政、大计、大战、大事而忽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地说,上古楚国的开辟创制,从秦汉到明清事关大局的历史事件、体制兴革、政局清浊、经济荣枯,晚清民国年间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社会的早期现代化成败,均是着力较多的重点;而环境、社会群体及其生活、精英文化与俗文化,乃至人口、妇女、群众心理等问题,亦有较深入的探讨,力图让读者看到历史的更多层面。

《湖北通史》没有在通史卷之外另外设置专门史和人物列传,而是将其完全融会于8卷通史的章、节、目之中。但各卷结构如何安排,首先就碰到是分朝代或时段来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大块,还是打破一卷中的朝代和时段界限,按几大块分门别类地写下来的难题。《湖北通史》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前中期)、晚清、民国8卷,各卷情况不同,如先秦卷时代太长,现有史料亦难以满足分部类撰写的要求;秦汉卷中秦期时间短而汉朝时间长;魏晋南北朝卷朝代更替频繁;隋唐五代卷的情况类似秦汉卷;宋元卷中两朝的政治、文化差异较大;明清卷两个朝代都较长,资料亦相当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如一律要求先分朝代或时段、再分几大部类来写,就可能出现若干空白,或者显得重复零乱;反之,如一律要求先分部类再分朝代或时段,有的又跨度太长,不能鲜明地从总体上体现出历史的时段性。

《湖北通史》的作法是:从实际出发,各卷可以灵活地进行组织结构,但从划分朝代和时段入手、从划分几大部类入手这两种组织

方法,在每卷中都有体现,并可以各有侧重。具体地说,朝代较短的、制度相同相近的,可以打破朝代界限,连贯起来写;朝代或时段长、差异大、内容多的,可以先分时段来写;变化区别明显的,如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等,可以分朝代或时段来写;相对稳定的,如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可以连贯起来写。采用这种从实际出发的灵活手法,无非是让形式(体例)服从于内容,更好地实现全面贯通和突出特色这两个目的。

再从已有的史料和研究状况而言,各卷可资利用的基础也不一样。先秦部分虽然距今时代久远,但有关考古发掘、楚史研究的成果却蔚然可观;从秦汉到隋唐五代甚至宋元,有关湖北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却相对薄弱;到明清、晚清、民国3卷,已有研究和资料又特别众多,客观上全书可能会形成两头丰富、中间薄弱的失调状态。各卷作者对已有研究资料较充分者,注意了取舍、综合、创新;对已有研究资料不足者,则多方搜罗、挖掘、借鉴。有关考古发掘报告、专门史专题史新旧著作和大大小小的论文及文中资料,均被充分利用,从而使得全书各卷篇幅不至过于悬殊。而且各卷作者即使是对自己现成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是在重新审视的基础上,经过认真修改,才加以利用的。尽量做到不重复他人,亦不重复自己。

三

对目前已成书的《湖北通史》,作者希望它不仅能全面系统地再现湖北历史的全过程和整体面貌,还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努力的探索。

其一,使整体的史学内容更丰富、更饱满、更多样,特别是通过对湖北历史资料的新发掘和再研究,书中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

问题。宏观者诸如华夏文明源头是单一还是多元的问题,内陆是否一定封闭、海洋是否一定开放的问题,上古乃至秦汉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奴隶劳动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性质的判定问题,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在统一或割据状态下,地区的地位和社会发展的特殊状态问题,唐宋以后阶级矛盾和官民矛盾的表现问题,土地兼并集中与生产力提高而又造成大批流民的关系问题;微观者诸如历史上湖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与商业发展不同步、中央政权的某些政策法规并未在湖北实行的问题,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问题,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变迁与自然灾害的关系问题,晚清和民国时期湖北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及其未能持续发展的问題、新兴社会力量的发育及其幼弱状况问题等等,类似的情况甚多。这些不仅是湖北历史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史学的研究。《湖北通史》的作者们对于其中一些问题表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相信史学界无论是撰写中国通史、专门史、专题史、其他地方史还是作各种相关研究,必然要就涉及到的有关问题加以思考和讨论。

其二,《湖北通史》展示了湖北历史进程的某些特征。中国的历史进程有整体的特征,各省区的历史进程有自己的局部特征,如北方中原地区(主要是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及河北)在上古至秦汉遥遥领先,魏晋以后发展渐缓;唐宋时再度振兴,到元代再次落后;此后一直到20世纪中期,在一些社会指标方面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几省。而南方文明发展的程度,在秦汉时期明显比北方逊色,从魏晋衣冠南渡开始,人文教化已能与中原互争雄长,至明清则经济、文化均赳赳有后来居上之势。与此相一致,统一的中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如都城),从秦汉到北宋一直在陕西、河南两省境内,南宋以后,重心往东往南移动,都城就一直在沿着大运河、津浦线作南北移动。

地处南北交界的湖北,又是一番情景,其社会发展呈现出缓慢乃至停滞与跳跃突进的间歇形式。楚人引以自豪的祖宗之一庄王曾说自己“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正可移作湖北社会发展特征的写照。前面说到,在石器时代,湖北亦是有人类祖先活动的地区之一,但文明主要标志之一的国家形态却比中原晚出几个世纪(虽然仍早于中国南方各地)。楚国建立,形成独特的楚文化,社会发展出现了第一次跳跃突进。在秦和西汉,湖北又呈现出停滞状态。东汉略有回升,自三国时发展趋缓,下至隋唐宋元,其间进退不常,境内各区域的开发既不平衡,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亦不同步。明中期以后湖北社会又有跳跃突进之势,有“天下四聚”称号之一的汉口迅速崛起,但从明末清初起又发展缓慢。清末张之洞在湖北实施新政,湖北再次出现跳跃突进,但不到20年,民国初年的湖北在全国又只处于中下等水平。所以说,湖北历史上虽有“鸣将惊人”、“飞将冲天”的辉煌,但也有不鸣不飞的停滞时期,而且后者的时间远远长于前者。出现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复杂,《湖北通史》有关章节对此亦有所探讨。

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也有一个移动过程。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论湖广》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又说:“三郡之于楚,如鼎足然。”顾氏所谓“形胜”,侧重于军事和交通的意义,其实这三足更是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而且顾氏只考虑了空间问题而未考虑时间因素,事实上这三足是依次兴起。先秦时中国尚未统一,楚国的根本之地是两湖,从荆州渡江就直通湖南,所以楚国的重心在荆州。统一的中国形成之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而襄阳正处在北上中原的门户之处,也是南北文化汇合之处,所以从汉代起,荆州虽然仍很重要,但襄阳已有与荆州并驾齐驱之势。从

三国至唐宋,第三足武昌定型。南宋以后,中国东南部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鄂东南最便于与外地尤其是江浙和东南沿海交流,于是汉口崛起,最终武汉取代襄阳和荆州,成了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所以这种重心移动显示出明确的历史发展轨迹。

其三,《湖北通史》还试图归纳出湖北历史上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首先体现在开放博取的观念和行动之中。从上古先民的容纳三苗文化遗传、汇融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以及巴文化;到先秦、秦汉的儒道相安;其后的接纳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直到近现代的接受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都反映出该地区的文化的不拘守、不狭隘的特征。其次是强烈的民本位观念,颇带有“人即是目的”的价值含义。荆楚人民具有反抗强暴的传统,而从屈原到闻一多,均体现出爱国同时爱民、爱民即是爱国的思想感情。再次是崇尚自然、放任天性、追求个体的自由与尊严,不盲从偶像和权威,骨鲠敢言,这又具有某些道家和“楚狂”的色彩,故在文艺上不重功利,汪洋恣肆,想象奇特,瑰丽新奇,丰富多彩。秦汉以来的湖北文人,虽也服膺孔子,但总觉得屈原更亲切,视其为乡邦文化代表和人格楷模;对出自中原的黄帝也尊为人文始祖,但对战败的炎帝和蚩尤、造反犯上的共工和敢于公开承认“我蛮夷也”的楚武王,总有几分好感。虽然秦汉以后的湖北人大多数说不清自己的祖先来自何处,远祖是谁,但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和整体性的文化传统一样,能够或多或少地影响和塑造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这里要作两点说明。一是区域性的文化传统也好,整体性的人文精神也好,都是与其他区域其他整体比较、相对而言的,各个区域或各个整体也有相似相通之处;而一个区域、一个整体内部,文化传统也不可能永远完全不变,所以人们对一种文化传统可能有不同的总结。二是作者并不讳言湖北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缺陷。诸如缺乏韧性、流动不居、多谋少断、容易满足等,《史记》和《汉书》

中早有类似的看法,当然千百年来已有所变化。而且这些缺点有的是伴随优点而产生的,如不拘守、不狭隘是优点,一旦过度形成流质易变,就成了缺点;有的则是因为客观环境条件所致,如湖北的易受旱涝之灾,又是所谓四战之地,使得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不易积累,历代有形的文化积淀不易保存,这些对历史上湖北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影响。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具有基本真实的一面,也有加工构筑不断强化的一面。围绕文化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就是发掘和弘扬传统的积极因素,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湖北通史》的主编和各卷作者,均长期从事中国史教学和研究,既具有通史知识的必备素养,又分别是有关断代史、专门史的专家。数年来,大家兢兢业业,把编写《湖北通史》当作一项重点工程和名山事业来做,即既要对现实的精神文明有益,又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除了上述种种努力之外,各卷后附录的大量参考文献和所作索引,均能大大方便读者和研究者。即使若干年后有了新的考古发掘和新的史料出现,有了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需要重写《湖北通史》,现有的这套《湖北通史》也必然是后来者的基础和津梁。

当然,目前由于各卷可资利用的基础不一样,作者们能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不一样,分析、综合、表述的方式也未必一致,这些必然使得目前这套《湖北通史》难以成为尽善尽美之作,诸如在整体和局部重合之处可能缺乏地域性资料;若干论述未能准确把握分寸;还有详略不够恰当,风格不够统一等等,有待商榷提高之处甚多。欢迎专家和读者多提批评意见。

对本书的编写和出版,湖北省人民政府、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一直予以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前 言

天造地设,湖北恰好在长江流域的中轴线上。长江流域,南边靠近北纬 25° 线,北边靠近北纬 35° 线,它的中轴线是北纬 30° 线。

事有凑巧,北纬 30° 线也是旧大陆古代文明带的中轴线。埃及的古都孟菲斯,号为“神之门”的巴比伦,波斯帝国极盛时期的首都苏萨,以及南亚最早的两座古城之一哈拉巴,都在北纬 30° 线附近。古代的长江流域,西有巴文化和蜀文化,中有楚文化,东有吴文化和越文化,它们的中心也无一不在北纬 30° 线附近。

《湖北通史》所要介绍的只是古往今来的湖北,然而,正像庄子所讲的,“大知观于远近”(《庄子·秋水》),为了对湖北的历史和文化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估,不妨借用影视的术语,镜头不能定死在一个距离上,总要一会儿摇远,一会儿摇近。摇远,是为了知道世界之大,品类之盛,不做类如井蛙和夏虫的曲士;摇近,是为了洞察湖北历史的一丘一壑,以及湖北文化的一草一木。

湖北的先民没有愧对天地的厚赐,他们创造的文化很有个性的魅力。现有的考古发现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我们未知的比我们已知的无疑要多得难以数计,在本卷所包举的历史时期内,有延祚约八个世纪之久的楚国,其文化之灿烂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可是,我们所能征引的实证多为小型墓和中型墓的出土文物,与大型墓的出土文物比较就相形见绌了,而迄今已发掘的大型墓还很少。至于王墓,则已发掘的连一座也没有。因此,我们尽管把出土文物

写得如数家珍,也只能为楚文化描出一幅速写来。对此,我们深为抱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能如此。

本卷从洪荒时代写起,不仅是为了便于说明生态环境的变迁,而且是为了便于说明先民“筚路蓝缕”之难能可贵。

我们写到早期人类的一些遗迹,只是用以证明湖北这个地方适合早期人类生存,绝不意味着要把古代的乃至现代的湖北人同那些只留下了零星骨骼化石的早期人类攀亲。

迄今已知湖北文化的源头是江陵鸡公山旧石器文化遗址,其下层的上限为距今约四万年至五万年前,其上层的下限为距今约一万年前。先前所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大抵在洞穴中,江陵鸡公山旧石器文化遗址却在弥迤平原和汪洋水乡中。我们可以确信,江陵鸡公山旧石器文化的主人,只要没有因遭遇特别严重的天灾人祸而灭绝,即使不是现代湖北人的远祖,也一定在现代中国人的远祖之列。

新石器时代不像旧石器时代那么漫长,但在湖北也延续了六千年至八千年之久。当我们看到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雕人头像时,仿佛在不期中邂逅了自己的祖先,几乎忍不住要向他们嘘寒问暖。这些玉雕人头像是或多或少变了形的,但都有性格、有气韵。当我们看到这个遗址出土的近乎成群结队的许多惟妙惟肖的陶塑动物像时,仿佛发现了自己的祖先把纯真的童趣贯注在精熟的技艺之中,不禁叹绝。当我们看到这个遗址出土的玉雕凤和玉雕龙时,又不禁为自己祖先神秘而美丽的信仰而遐想联翩。

天门石家河有一座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它在全国已知年代最早的几座古城中的规模最大的一座,虽则还是城寨,不是城市,但也称得上弥足珍贵了。这个遗址的文化内涵肯定尚未揭示无余,假如以后有前所未知的重要遗物出土,迫使我们修正现在这个可能是保守的评估,我们将额手称庆。